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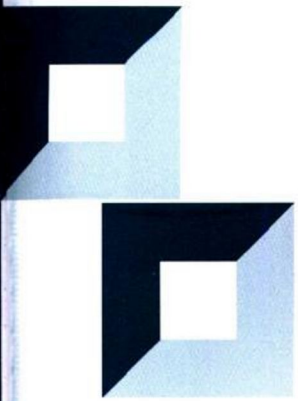
杨耕 著

为马克思 辩护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京华学人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为马克思 辩护

杨耕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马克思辩护/杨耕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1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京华学人卷)

ISBN 7-207-05183-2

I. 为... II. 杨...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
特色—理论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762 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封面设计:于克广

为马克思辩护

Wei Makesi Bianhu

杨 耕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印张 21.75·插页 2
字 数	525 000
印 数	1 - 2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183-2/A·38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
／
者
／
近
／
照

作者简介

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唯物论研究》(日本)、《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专著10本,代表作为《杨耕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科研成果先后6次获国家级奖,7次获省部级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所基金资助。

总 序

中国的历史似乎越古越辉煌,雄汉盛唐、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部中国古代史灿烂辉煌,让人留连忘返。然而,盛极而衰,这是一个古老而平凡的真理。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一部中国近代史黑暗悲惨,让人不忍卒读,战祸离乱、割地赔款、百年凌辱……“长夜难明赤县天”。历史的这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然而,从 1957 年开始,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误入历史的沼泽地。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天地。

从 1978 年至今,短短的二十余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是“弹指

一挥间”，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当代中国正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这种市场化、现代化又是同社会主义改革密切相联甚至融为一体的。换言之，我们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一次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必然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学术研究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否则，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甚至是“无病呻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这是学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来，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与学术前沿性论题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必然构成学术前沿性论题，而真正的学术前沿性论题归根到底是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二者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亮丽的风景线。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贫困，甚至走向衰落。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市场经济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当代的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新的实践必然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必然为学术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反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日趋繁荣,走向成熟,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正因为如此,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辑了这套“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京华学人卷)。

首批列入这套丛书的有八部著作,即赵敦华教授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万俊人教授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杨慧林教授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黄泰岩教授的《探求市场之路》,朱勇教授的《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景天魁教授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李强教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以及杨耕教授的《为马克思辩护》。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尔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同步进行。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到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显示出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理论主

题。这些著作或者直接从现实出发去描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似乎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实际上在间接地探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纵目远眺,通过对理论本身的批判反思回归现实,从而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每一个心灵都有它的望远镜”(狄德罗)。作者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深入掘进,在学术研究中深刻反思,从而将理论触角伸到了现实深处,同时,又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

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到高屋建瓴,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里,对大变革的礼赞和对旧体制的否定融为一体,真实的描述和理论的反思融为一体。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你不能不敬佩作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激起你探索的激情。

在我看来,这些著作既无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也无一味取悦于读者的卑贱之心,相反,它们只是作者们二十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他们学术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的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丝毫不否认这套丛书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坚持的比一般人更厉害。”(卢梭)因而,对于学者来说,随时准备抛弃成见、修正错误尤为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将“执著”,即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但不“固执”,即拘泥于成见或错误。只有当我们从对错误的错误理解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合乎真理的方式去谈论真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批评,而不管这种批评是出自善意还是来自恶意。

但是,我们达不到这样一种要求,即“完善”。在我看来,追求完善,这是学者的品格;要求完善,则是对学者的刻薄。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分的要求。“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因此,向学者以至任何人要求完善,实际上是向他索取生命。

杨 耕

2001年11月于北京西山

“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代前言)

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哲学研究》、《唯物论研究》(日本)、《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先后出版《杨耕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等专著10部。这些论著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宽广的理论空间、独到的理论见解,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引起哲学界、理论界的广

^{*} 这是《学术界》杂志特约记者王峰明博士对我的采访录,它准确地反映了我的学术观点,概括地反映了我的人生态度,所以我把这篇采访录作为全书的代前言。这篇采访录的原文发表在《学术界》2001年第2期。

泛关注。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峰明博士就“学问人生”话题采访了杨耕先生,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后发表于下。

一、体验哲学

王峰明(以下简称“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哲学似乎是一门艰涩隐晦、枯燥乏味的学科,高深莫测,与现实无关。看到您的一些文章和媒体对你的访谈,发现您对哲学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对哲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杨耕(以下简称“杨”):我之所以“爱”哲学,是因为哲学本身“可爱”,而哲学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哲学关注的是人,哲学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密切相关,与解答人生之谜融为一体。无论哲学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印象。如果哲学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当然,我注意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饮食男女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悲剧却是一种社会现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是否把握和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人生观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反过来说,哲学应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关注人,从人的活动及其规律中去把握人本身。这样,哲学就会既

可爱又可信。哲学之所以给人们一种艰涩隐晦、枯燥乏味、与现实无关的印象,这是由于哲学的论证方式造成的,即哲学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运动,这种抽象的概念运动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这种抽象概念运动背后的现实问题。换言之,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哲学的问题却是现实的。哲学家无论如何“超凡入圣”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提出特定的问题、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答案。即使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信奉“语言游戏论”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用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是在一个已经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里去历史地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什么关注“知识、学术、理论同现实的关系”,而德里达为什么提出解构必须向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社会结构挑战。实际上,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运动反映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人的现实的运动。这就注定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选择了哲学并想站在这一领域的制高点上,谁就必须在精神乃至物质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王: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当今中国的哲学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冷寂”、衰落将呈加速态。

杨: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和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

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哲学肤浅甚至庸俗的理解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哲学“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一种对哲学本身的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当今中国的哲学走向成熟。换言之,当今中国哲学的“冷寂”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中国哲学的成熟。

实际上,市场经济与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近代的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没有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以及解构主义哲学,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而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又是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可谓史无前例,必然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人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在我看来,目前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是对以往哲学虚假繁荣的矫枉过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中国哲学必将加速走向真正的繁荣。

王:您谈到了哲学的重新定位,这涉及到哲学的功能,涉及到哲学家的使命问题。您如何理解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使命?

杨:哲学的功能是什么,或者说,哲学应该干什么,这是一个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需要不断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

的对象、性质和功能这样一些对学科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哲学也是如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当根据时代需要、人类的认识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结构来判断哲学的位置和功能。哲学并不等于科学,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换言之,在当代,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所谓的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只能是“形而上学”在当代的“复辟”。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促使哲学趋向于生活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应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此,哲学应探求和把握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批判的精神、反思的方法,并通过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性以及理想性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我始终认为,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是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必须与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否则,哲学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同时,这种经济市场化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代,构成了一场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关注这一现实,从中探讨、把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建构当代

中国的民族精神支柱,这是当代中国哲学义不容辞的任务;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反过来,以一种面向 21 世纪的哲学理念引导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哲学家不能“作茧自缚”,与现实隔绝,喃喃自语,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在我看来,这样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

王:哲学联系现实是否就是仅仅理解、解释现实,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单向还是双向的?

杨:哲学与现实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哲学不能脱离现实,必须直面现实问题,解答时代课题,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哲学又必须进入抽象的概念运动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联系现实,解答时代课题。在联系现实的过程中,哲学不应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或仅仅成为现实的解释者。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在我看来,现实创造哲学,哲学也影响现实;现实校正哲学发展的方向,哲学也引导现实的运动。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现实。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对哲学的单向关系,忽视了哲学对现实的影响、引导作用,忽视了哲学本身的创造力量。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超越,而引导这一超越的就是邓小平理论,包括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王:您谈到了哲学的功能、哲学家的使命以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我们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现在一些人强调哲学应该远离、脱离政